本版编辑：张丹丹
E-mail：t2@studytimes.cn
Tel：010—62807315

世界经济

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再现抬头之势

全球各经济体应该旗帜鲜明、言行一致地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杜绝在这个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各经济体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应该在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和相互尊重对方核心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对话与协商、深化双方的互利合作、开拓合作新领域等加以化解。

□ 刘 东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就不断加大。一般来说，贸易保护主义与经济危机总是相伴相生。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全球经济增长显著放缓，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严重。然而，近几年在各国经济开始持续复苏之际，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却再掀抬头之势。

这首先归因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分化。目前，欧美的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作为刺激经济政策副作用的大量政府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企业存货的增加和产能过剩的阴影，正在威胁脆弱的经济复苏。为了保障本土的民族工业，提振企业的发展，他们就举起贸易保护主义这面旗帜，用贸易保护主义来抵制产品进口。

2016年5月12日，欧洲议会全体会议以压倒性票数通过一项非立法性决议，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并呼吁欧盟采取反倾销措施。决议强调在中国满足欧盟关于市场经济地位的五大标准前，中国对欧出口仍应按照“非标准”方式对待，即在对中国商品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过程中，仍应评估中国商品的成本和价格是否是市场价格。不难看出，欧盟担心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后，将有更多中国商品进入欧盟市场，从而威胁欧盟企业生存、影响欧盟就业。

表面看来，欧盟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是用诸多标准衡量的结果。其实，一直以来欧美都不愿接受中国迅速崛起的事实，把“全球经济的失衡”归结为中国对他们的贸易顺差，甚至进一步归结为中国的产能过剩。无视自身的经济结构问题，却要中国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失衡买单，这是西方国家频频对中国采取贸易保护措施、挑起贸易摩擦的根本原因。

欧盟还有一个机会，就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力推的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欧美两大经济体占全球经济总量一半，如果欧美达成协议，将会建起世界最大的自贸区。欧盟自2013年起与美国协商跨大西洋贸易及投资伙伴协定，意在废除贸易障碍、相互扩大开放，但一直出于保护各自市场，无法化解歧见。

自从TTIP谈判启动以来，欧美在多个领域中存在分歧。比如在食品标准上，转基因食品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70%，而欧洲转基因食品几乎为零；在化学品标准上，欧洲任何化学品必须证明安全以后才能在产品中使用，而在美国化学品被证明有害以前就可以使用；在服务业方面，欧盟拒绝完全开放视听产品市场，美国拒绝讨论金融监管政策合作；在公共采购问题上，欧盟继续要求美国放宽公共采购市场准入条件，美国的态度则十分模糊。双方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合作、汽车制造、农业、葡萄酒等领域也存在重大分歧。由于TTIP的内容超出欧盟议会立法的授权范围，欧洲各个成员国议会需分别通过TTIP法案才能使其生效。这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欧盟中任何一国对其的否决都会导致TTIP流产。

德国总理默克尔虽然表面上与奥巴马保持一致，但看法也在发生变化。德国态度的转变在于：一是因为德国相对明显的经济成功导致不愿意改变现状。德国平稳渡过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近几年经济增长强劲、工资增长明显、失业率较低，经常项目盈余激增到GDP的8%。二是源于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大潮。民众认为欧洲一体化已经削弱了成员国主权，TTIP又赋予企业投资者超越东道国的仲裁机制，担心市场受到进一步侵蚀。三是认为TTIP主要造福富人，引起了工会和其他组织的反对。

法国作为传统贸易保护国家，对TTIP态度一向强硬。法国政府在一开始就要求将法国电影行业排除在TTIP的谈判之外，以保护民族电影业。法国总统奥朗德甚至一度表态，考虑叫停谈判。在2017年总统大选不到一年之际，最近法国政府要员纷纷表示反对这一协议，理由是法国不同意没有规则的自由贸易，市场需要保护。

英国政府具有自由贸易传统，曾经明确支持TTIP；但是，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已经揭晓，欧盟也已通过决议催促英国尽快启动脱欧程序，英国已与TTIP谈判没有关系。英国脱欧是欧洲一体化的重大倒退，也是贸易保护、投资保护、就业保护的又一表现。

而在美国另一侧的太平洋，覆盖全球经济总量40%的TPP（跨太平伙伴关系协议）谈判，12个成员国政府于2016年2月终于签署协议。但这一巨大规模的贸易协议要在各国立法机构通过、生效，还需大量艰苦的工作，甚至有可能出现变数。2017年美国白宫将易主，而德、法等国家面临大选。如果拖到下一届，新政府对TTIP的态度也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比如美国的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特朗普都曾经公开表示反对。在日本，TPP主要谈判者、经济部长甘利明的辞职，可能使TPP在日本通过更添困难。而新西兰总理约翰·基在奥克兰演讲称，签署是“重要一步”，但协议“在实际生效前，仍只是一纸文书”。



除了TTIP、TPP之外，南美的南方共同市场日前也陷入了困境。2015年12月底举行的南共市峰会上，巴拉圭总统卡特斯在开幕致辞时就表达了成员国的共同担忧：南共市在推进地区一体化和成员国经济增长方面的动力正消耗殆尽。乌拉圭《国家报》则发表评论指出，过去三年，南共市作出的经贸合作决议只占总决议数量的11%，其中只有15%涉及发展同区域外国家的经贸合作。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委内瑞拉等国家组成的南共市，强调支持国家干预、地区关税同盟和内部贸易整合，对区域外的国家有一定的壁垒作用。

其实，TPP、TTIP等区域经济组织的难产是一种贸易保护的表现；但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本身也都是一种保护壁垒：组织内部的就保护，组织之外就挡住。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背后其实是各大国在保护本国利益、发挥本国比较优势。

可以发现，从应对金融危机开始，各国就纷纷祭出了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但如果各国都依赖贸易保护，而逃避触动实体经济改革，就不可持续。当然另一方面，各国都推动本国货币贬值，刺激贸易出口，实际上就是利用别国需求，拉动本国经济，把危机转嫁出去，也不可取。

全球各经济体应该旗帜鲜明、言行一致地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杜绝在这个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各经济体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应该在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和相互尊重对方核心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对话与协商、深化双方的互利合作、开拓合作新领域等来加以化解。各经济体应该在顺应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潮流的基础上，对当前全球经济结构调整中出现的新问题作出积极的应对。

走出金融危机、恢复经济增长的根本出路在于各国的结构性改革。当前有些国家的政府治理、政党政治带来的短视性，也天然成为改革的阻力。只有加强结构性改革，才能提高生产率和实际产出。中国一直致力于推进国内的结构性改革，而且正式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今年中国作为G20的轮值主席国，使得深化结构性改革得到了各国前所未有的重视。改革的进程无疑任重而道远，但日前G20财长会议公报所显示的各国对结构性改革的重视和讨论，至少表明了一种积极的态度，即注重经济政策与结构性改革的配合，以实现短期增长和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平衡。

中国应加强在区域层面上的贸易协调，进一步推进自贸区建设，扩大区内自由贸易，加快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积极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一定程度上可以绕开贸易壁垒。同时，努力扩大内需，调整对外贸易结构，减少对欧美尤其是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

德国人的社会生活与工匠精神的内化

□ 潘墨涛

德国工匠精神的表征与世界上所有国家工匠精神一样，但将工匠精神内化为国家民族性格的却是德国人独特的社会生活。现代社会集体意识推动了传统工匠精神现代化，而政府对社会生活的严格规制又在工业化大潮中将工匠精神保护了下来。在这种社会生活基础上，德国工匠精神特征更加明显，“荣誉”“责任”“协作”“政府规制”成为其核心标签。

传统城邦责任意识造就德国工匠的荣誉与独立。城市自豪感是每一个德国人的特质，传统城邦责任意识是德国工匠精神产生的根源之一。中世纪德国的城邦自治为传统手工业提供了独立自由的发展环境，不同城邦间手工产品多样化、个性化特征被无限放大，推动了城邦自豪感和责任意识的兴起。至今依然可以看到，德国5万、10万、20万人的城市众多，人口少而凝聚力强，正是这种对城市的自豪感和荣誉感，使每一个德国工匠都以城市为内心的“招牌”，在荣誉中寻找价值，创造独特新颖的产品，不断提升质量，力图做到极致。



现代社会集体意识推动德国传统工匠精神现代化。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德国人的社会生活更重“集体性”，这与传统强调个体劳动的工匠有很大区别。德国人的社会生活处处体现出个体对社会集体、对马克思预言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集体的依赖，“在真实的集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真实的集体“本身就是个人自由发展的共同条件”。所以，德国工匠精神表现出一种集体主义的协作精神，一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高度责任感。也正是因为这种协作精神，把匠人对“物”的责任感扩展为对“同伴”的责任感，将原本德国中世纪仅与“外在物”打交道的工匠转变成现代劳动分工协作的合格匠人——在分工中保留了工匠的乐趣和荣誉，把协作完成的艺术品与每一位参与其中的匠人联系起来。

政府对社会生活的严格规制是德国工匠精神的重要保障。历经工业革命、大工厂流水线分工生产的冲击，德国工匠精神能够延续至今离不开政府对社会的规制。18世纪时德国各城邦就有严格的商标保护法律，吸引了大批欧洲各国手工业者。二战后德国实施社会市场经济制度，打击垄断、鼓励竞争，出台了一整套严格的法律鼓励家族企业发展，培养了一批“隐形冠军”中小企业，保护了工匠们的热情与积极性，使工匠精神可以在各个领域继续成长。同时，德国政府也制定了一套详细的行业标准和质量管理认证机制，针对出口产品建立事前管理、事中监控、事后处理程序，在政府应当发力的领域强化规制，从正负两方面对工匠精神提供保障，影响着工匠的社会生活。

环球瞭望

编者按：2016年5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和进一步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关工作。优化提升首都城市功能定位、推动非首都功能疏解成为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许多国家在首都建设中都曾面临同样的问题，其中，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经验做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首都规划的典范之作

□ 陈 偲

美国于1790年定都华盛顿，其正式名称为“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是由美国联邦政府直接管辖的特别行政区，靠近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不同于大多数首都城市集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功能于一身，自建设之初，美国首都的功能定位就清晰明确，即美国的政治中心。首先，为明确首都的单一功能定位，美国特选择地理位置偏僻、远离大城市的华盛顿作为首都。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空间分离不仅可以分散城市功能，减少城市在交通、人口等各方面的压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联邦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更容易使权力得到制约。其次，在首都城市空间规划方面彰显出美国政治中心的特色，华盛顿环境优美、绿地广阔，少有商业街区、工业企业，遍布城市的是政府机关、公共建筑、文化机构。华盛顿的标志性建筑是国会大厦、总统府白宫和最高法院，整座城市由三大建筑连接延伸，形成三角形、放射状的城市轴线。由于定位明晰，多年来华盛顿面积和人口都基本稳定，总面积为6094平方公里，市区面积为178平方公里，人口保持在60多万。

重视规划制定

华盛顿的城市规划围绕政治中心的定位进行，历次规划及其修订均有相关政策法规的支撑，具有延续性、前瞻性，是实现首都核心功能的基本保障：第一，初步规划（1791年）：聘请法国军事工程师朗方对城市进行规划，华盛顿城市格局的总体框架和城市规划的基本原则在这一时期得以确立，并且一直保留和延续至今。比如三角形城市轴线的分布、市中心周围建筑物高度不得超过国会大厦高度（33.5米）、不布置和发展大型工业建设项目等。另外，这一时期的设计具有超前性，华盛顿的道路、基础设施、园林绿化都是按照80万人口的容量规划，即使200多年过去了，城市仍有足够的发展空间，避免了城市建设的重复与浪费。第二，完善规划（1952—1962年）：这一时期主要以法律为基础，根据城市发展需求进一步完善城市规划方案。美国政府于1952年颁布《首都规划法》，为首都的发展规划提供法律依据。1962年，在之前相继出台7个方案的基础上，正式提出公元2000年的首都地区规划方案。该方案主要针对华盛顿承载能力有限的问题，计划分散一部分城市功能到周边地区，以城市为中心向外伸出6条放射形轴线，布置一批规模不同的卫星城镇或大型居住区。第三，规划修订（1994—1997年）：此次规划修订在美国联邦政府和华盛顿市政府共同组成的“首都规划委员会”领导下进行，重点在于保持城市的历史延续性，完善道路交通系统，优化市区布局。

加强卫星城建设

为疏解非首都功能，按照首都地区规划方案，美国政府在华盛顿邻近的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等地区建设一批卫星城，为首都提供经济、教育、医疗等功能，与首都协同发展。目前，卫星城的建设已取得一定成效。

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良好。首先，卫星城的新兴产业发展成熟。在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的许多卫星城中，高新企业数量已超过硅谷，形成美国最大的生物技术产业带，其中华盛顿郊区蒙哥马利县拥有220多家生物技术公司，占据马里兰州总数的2/3，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其次，生活配套设施完善，医疗、教育资源充足，许多人都在华盛顿上班、在卫星城居住生活。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统计，截至2016新财年，华盛顿常住居民为67.2万人，而工作机会为77万多个，越来越多的人工作地与生活地分离。

发达的交通系统支撑卫星城。第一，华盛顿地铁是仅次于纽约的全美第二大地铁系统，共设6条线路，91个站，在市内以及邻近卫星城的主要生活区都设有车站。同时，在入城口地铁附近设有政府投资建设的大型换乘停车场，方便人们停车并换乘公共交通进入市内。第二，发达的公路交通系统。华盛顿市内公路呈网格状、密度高，并常在高峰期进出城的道路上设置潮汐车道以提升利用率。同时，连接首都与卫星城的高速公路、跨海大桥等交通系统发达，比如位于马里兰州的切萨皮克湾跨海大桥，缩短了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和华盛顿的距离，加强了彼此间的交流联系，促进了周边卫星城的发展。

公众参与卫星城规划建设。为避免卫星城的盲目建设，同时遵循美国居民参与城市规划的传统，政府常组织当地居民参与到卫星城发展规划的制定中。在华盛顿郊区、马里兰州巴的摩尔市、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等地，均开展过由规划人员、社区代表、公众、决策部门、企业等不同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城市规划活动。比如阿灵顿县的社区规划、住房与发展办公室在征求当地公众意见后，公布了符合居民需求的城市发展原则，包括妥善发展商业与轻工业、提供与州际高速公路配套的道路基础设施、在地铁附近建设办公楼与住宅等。

独具特色的首都经济

政治中心的单一功能定位并不意味着华盛顿经济活力的下降，良好的环境酝酿了独特的首都经济。在2016年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行榜”上，华盛顿全球排名第七，成为美国仅次于纽约的第二大金融中心。根据2015年美国官方统计数据，华盛顿GDP为1055亿美元，人均GDP居全美各州第一，同时也是全美人均收入水平最高的城市。

华盛顿具有鲜明的首都经济特色：第一，与周边卫星城联动发展，附近的中小城市群以华盛顿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大型都会区。华盛顿都会区的人口已经接近600万，经济总量接近5000亿美元，在经济规模上名列全美第五。第二，华盛顿的经济与联邦政府部门密切相关，而联邦政府的运作很少受到经济萧条的影响，所以华盛顿的经济相对运行平稳。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华盛顿成为全美经济表现最好的城市之一。第三，大量的政府购买服务需求带动了法律、金融、信息、科技服务等多个产业的发展。第四，世界五百强企业将总部设在华盛顿，涉足电力、教育、金融投资、房地产等行业，华盛顿的经济产业逐渐多元化。

战略视角